

◎司马周 著

茶陵派

与明中期文坛研究



茶陵历史与文化丛书

湖南人民出版社

茶陵历史与文化丛书

茶陵派

与明中期文坛研究

司马周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司马周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438-6807-6

I. ①茶... II. ①司... III. ①茶陵诗派—文学研究 IV. ①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6888号

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

司马周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张志红

装帧设计: 张毅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u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0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6807-6

定 价: 30.0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序一

陈书录

正当“接天荷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之时，欣闻司马周博士的学术专著《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即将出版，不由得回想起十多年来他以“荷花别样红”的热情追求学术新境界的点点滴滴，欣慰之中颇多感慨。

司马是刚跨入21世纪之时，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入学后不久便将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定为《茶陵派研究》。曾记得，20世纪后期以来学术界逐渐注意明清区域文学的研究，引起人们很大关注的有王学泰的《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年5期）、严迪昌的《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康保成的《苏州剧派研究》（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曹虹的《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沙先一的《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徐永明的《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广宏的《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韩结根的《明代徽州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德慈的《常州词派通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刘勇刚的《云间派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巨传友的《清代临桂词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纪玲妹的《清代毗陵诗派研究》（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等，对明清有关区域文学进行专题研究，颇有深化与开拓；还有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乔力等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版）、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范培松、金学智主编的《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

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其中有一定的篇幅论述明清区域文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自2002年筹建以来,至2009年8月先后召开了8届年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发表的论文中有不少有关明代及清代区域文学的论文,如罗宗强的《弘治、嘉靖年间吴中士风的一侧面》(何永康、陈书录主编,《首届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朱万曙的《明代民间诗人:以徽州为例》(同上),戴健、李昌集的《明下叶吴越刊刻中心与通俗小说》(同上),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朱万曙、徐道彬编,《明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版),魏崇新的《明代江西文人与台阁文学》(同上),周明初的《明代诗人的地域分布及相关问题》(同上),唐朝辉、欧阳光的《江西文人群与明初诗文格局》(罗宗强、陈洪主编,《明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夏咸淳的《论李流芳及明末嘉定文学》(同上),严明、童皓的《明代苏州文人功名心的分化》(同上),孙琴安的《明代松江艳情文学的特点和成因》(左东岭主编,《2005年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许振东的《十七世纪苏州地区创作与传播白话小说的文人群落》(同上),陈广宏的《明初闽诗派与台阁文学》(《2006年明代文学论集论》,廖可斌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舜臣的《明末清初岭南诗僧群综论》(同上),何宗美的《西湖八社考论》(同上)等。

司马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协助我进行首届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热情洋溢,用力甚勤,颇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后来又多次随我参加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特别是2009年8月由湘潭大学主办的“明代文学学会年会暨明代湖南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鞭策着司马加快有关湖南茶陵派研究的步伐。这部《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其中有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也有他在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指导下博士后期间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晶。

“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司马生于湖南，长于湖南，对于家乡湖南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湖南茶陵派的研究更是倾注着多年的心血，寄托着他不断追求的学术理想。

明清区域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及其指归之一，是探究与把握区域文学的区域特色，比较不同区域文学之间的异同，进而展示中国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发掘不同区域文学特定历史价值、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比如明清之际的云间（松江）派，是一个典型的区域文学流派，其区域文化背景是江南经济的繁荣、科举兴盛、东林党的影响与几社的活跃以及云间文士与名门望族的结缘，当然还有明清易代之际血与火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区域与时代背景下，云间派崇尚实学而又抗拒宋诗，复兴文学古典主义而又“忧时托志”，形成了充实与古雅融合、英雄主义精神与崇高美相结合的云间文学的特色。云间派处于明清易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云间派的词学尤其具有启下之功，直接引发了清词的中兴。云间派的诗学对近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南社诗人身上，南社是近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在诗学和人格上均推崇云间诗派，尤其倾倒于陈子龙和夏完淳。区域文学的区域特色往往在比较中更能相得益彰，比如清代中叶的毗陵诗派与性灵派在倡导性情、主张创新等观点上比较接近，而两派同谓性情，袁枚等性灵派将男女之情放在首位，而毗陵诗派更重视伦理亲情及朋友之情；毗陵诗派更重视诗品与人品，毗陵诗派重视学问而性灵诗派更重视才华。又如，清代毗陵诗派中的毗陵四子、毗陵六逸、毗陵七子、毗陵后七子等有一脉相承的“新变”特点，而同一区域的常州词派、阳湖文派、毗陵诗派都有“通经致用”的特点。诚然，在明清区域文学研究中还应该深入进行文献的发掘与整理，还应该在流派意识、主题取向、文学主张、审美情趣、意象或意境或人物形象、文学渊源等多方面继续深化与开拓，但尤为重要的是应该进一步强化明清区域文化与文学的交叉研究，努力把握不同区域文学流派或群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特征，以不同区域文学的特色以及作家的个性色彩来充分地展示明清文学的多样性、

丰富性,进而更加充分地显示明清区域文学特定的历史价值、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

司马的《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正是朝着这些学术追求的目标而努力的,因而,这部专著形成了他自己鲜明的特色。

一是资料颇为翔实,考论结合。茶陵派成员众多,有关文献资料相当繁杂,许多重点与难点问题需要用翔实的文献资料加以说明。司马论著中文献搜集比较全面,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资料考订工作颇为扎实,力求考论结合,去伪存真,颇见功力。例如,在第二章《茶陵派成员考》中的有关茶陵派成员组成的考订,虽学术界也有人对此进行研究,却较长时间尚无定论,司马以李东阳文集中有关的诗文交游为考证依据,多方钩稽明清文人的别集、笔记和相关地方志等,对茶陵派形成时间、成员身份以及茶陵派成员的构成进行了详细梳理考察,言之有据,结论可信。又如第一章《茶陵派的形成》中第三节关于李东阳著述情况的搜集,虽学术界已有成说,但司马却从原始文献的整理着手,重新搜集、辨析和考证,在搜罗现存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李东阳编著诗文情况重新思考,仔细爬梳,以详尽的考证订补了时人的缺漏,并用表格形式展示存佚情况,眉目清楚。还有如关于“茶陵派”名称源与流的考辨、李东阳乐府诗的典故出处、李东阳辞赋的汇总表等内容均是有考有辨,有论有据,不流于空谈。因而,这部论著建立在比较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

二是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研究茶陵派在明中期文坛的作用,视野开阔,角度新颖。论著既注重茶陵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个体研究,又注重分析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的交互关系,将茶陵派置于整个明中期文坛这一文学发展过程中加以探究,从纵向历时性维度与横向共时性维度两个层面对茶陵派进行比较研究和整体探讨,体现了作者较强的文学史通变意识,从而使读者能清晰地把握茶陵派在明代文学进程中的地位,如论著中第一、二、三、四章是从茶陵派形成、成员构成、诗歌创作、诗话理论等方面对茶陵派予以整体研究,挖掘茶陵派在明代中期文坛诗鲜明而独特的一面,而第五、六、七

章，则是通过对茶陵派与台阁体、前七子、吴中文学在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方面具体而微的比较，深入研究了茶陵派与三者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上的交融、纠偏和重构，较好地揭示了茶陵派在明代中期文学发展流变中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力。

三是力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司马通过对史料的挖掘和文本的解读，在研究中充分表现了茶陵派在明中期文坛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又通过对茶陵派与当时文坛流派错综复杂关系的深入研究充分突出了明中期文坛文风的丰富性和不可逆转的演变趋势，比较真实地展现了明中期文坛的真实历史，史料搜集与文本分析有机地融合。如第一章《茶陵派的形成》中关于茶陵派流派形成背景的研究，司马用史学的眼光详细考察了茶陵派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既注意茶陵派在社会大背景下所反映的共性，又突出其作为明中期文坛独树一帜的个性。在第三章《茶陵派宗主——李东阳创作论》、第四章《“用托之木，与沧浪并传”——论茶陵派的诗论纲领：〈麓堂诗话〉》两章的研究中，司马特别强调从史学层面研究茶陵派宗主李东阳在诗歌创作内容和文学理论批评上的特殊性，研究中既没有因为个人的喜爱而夸大对茶陵派的称颂，也没有因为历史的尘埃而模糊了对茶陵派本来面目的还原，司马在研究中尽可能地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力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在求实中创新。

四是分析比较周密，评论颇为允当。司马在研究中能对材料进行比较周密的分析研究，尤其是对茶陵派诗歌创作与理论特色的分析颇有见地，突出了茶陵派之所以立足于明代中期文坛的不同之处，如文中通过文献研究认为，茶陵派成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创作素材、创作手法上的特到之处，尤其指出茶陵派诗歌中充满了“郁郁之气”、“悯世情怀”和“苦闷心态”，司马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研究，追根溯源，剖析得细腻而深入。再加上作者对文本充分而细致地阅读，相关结论来自文本思考，因而论断均有依据，如司马认为李东阳辞赋试图摆脱台阁体风气，创作一些表现“畅达情思，感发志气”（李东阳《文前稿》卷五《〈沧洲诗集〉序》）的作品时，司

马是结合《拟恨赋有序》、《忠爱祠赋有序》、《冷庵辞》、《见南轩赋》、《东山草堂赋》等为文本分析得出的，仔细而周密，评论颇为公允。又如第四章关于《麓堂诗话》名称流变的考述，按名称的不同，从众多史料中进行细细辨别，分析严密，陈述清晰，论断明确。特别是论著中对于茶陵派与前七子成员关系的考证，从两派文集入手，详细分析两派成员间的密切交往，从而印证两派在诗歌创作上的相互交融与相互刺激，条分缕析，颇为允当。由此可见司马所思之细、用力之勤。

茶陵派乃至明中期文坛的研究是值得进一步深化的课题，明清区域文化与文学流派的交叉研究更是值得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学海无涯，任重道远，我与司马博士共勉之。

庚寅年“映日荷花别样红”之时

序二

杨海明

李东阳不仅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明史·李东阳传》评曰：“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明史·李梦阳传》亦云：“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这都说明李东阳在当时文坛的领袖地位。因此李东阳及其所领导的茶陵派兴起后，文坛有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沈德潜、周准《明诗别裁集》卷三），反映茶陵派的崛起对当时文坛带来巨大的冲击，为明代中期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的交互作用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持续不衰的探索热情，并逐渐聚集为当下茶陵派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十年来关于茶陵派研究的学术成果渐多，勋绩亦伟。司马周博士在此基础上，更进以茶陵派为研究中心，对茶陵派在明代中期的地位以及茶陵派与明中期其他文学流派的关系作了系统而宏观的探讨，可见后出转精，有明显的学术价值。

读了司马的书稿之后，总的印象是：这是一部很厚重、学术含量很高的著作，作者知识积累比较丰厚，切入问题的学术视角新颖独到，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底，长于考辨。作者能够在详细梳理、解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流派个体的微观研究与文学通史演变的宏观视角，将茶陵派对明中期文坛的影响做了清晰的分析和研究，既深入探讨了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其他文学派别的相互映射，又重点揭示了茶陵派在明中期文坛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该著作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

获。兹将其主要创新之处略举数端：第一是课题选择具有独特性、开拓性。茶陵派研究者虽众多，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的交叉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却没有，像书稿中关于茶陵派的形成、茶陵派名称的源与流考辨、茶陵派成员构成、《麓堂诗话》名称的演变等学术界鲜有提及，司马都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资料梳理与考订。第二是课题整体研究框架具有系统性、严密性。例如全书既分章论述了茶陵派的相关研究，又从诗歌理论与文学创作上研究了茶陵派与台阁体、前七子、吴中文学三者的交融关系，纵横交叉，纲举目张，体系显得十分周密。第三是课题研究重点的确定具有科学性。比如对茶陵派众多成员的考证和确认，就避免了既往研究中对茶陵派作为文学群体特征的忽视，纠正了以偏概全、无的放矢倾向，可以说抓住了文学流派研究的要害；茶陵派与前七子的关系，一般只注意到他们的不同点，本著作则不仅研究了他们的不同之处，还研究了他们在创作和理论上的相似点，从而可以看出茶陵派对前七子的影响所在，使研究不至片面。第四是课题的资料性和文献性特色鲜明，价值较高。作者注重考据与分析相结合，不作空洞的理论阐述。如对李东阳著述的搜集与著录，对李东阳乐府诗中引用正史材料的求证，对《麓堂诗话》版本的梳理甚至对李东阳辞赋作品的补正，都是建立在厚重的文献阅读基础上的，司马考据与评论并重，宏观与微观结合，相互阐发，富有很强的逻辑思辨。第五是课题征引丰富，具有巨大的学术信息量。作者所引用的文献，几乎涵盖了历史文献中对茶陵派的相关论述，对于文献中凡涉及茶陵派的地方作者都着力搜集和加以重视，并非常规范而详细地标注出处，在年轻学者中实属难能可贵，表现了作者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力。

司马在南京大学曾师从陈书录教授攻读明清文学史与理论批评方向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到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

研究工作，我是他的联系导师，因此相识相知。司马为人真诚坦率，为学严谨缜密。其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茶陵派研究，有很深厚积累，本课题是他博士论文选题的延伸与拓展。在书稿付梓之际，嘱我作序。相信司马此书的出版，能将茶陵派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故乐为之序。

庚寅年

于苏州大学东小桥寓所

前言

明代中期文坛是指从明宪宗成化到明穆宗隆庆年间（1465—1572）。这段时间文坛流派甚多，斗争复杂，但与理论批评上的建树相比，文学创作方面显得比较贫弱，大作杰作不突出。这一时期，也是明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流派纷呈、异常热闹的时期，尤其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崛起，给明代中期文坛打上了复古的烙印。

明中期文坛，台阁体文学发展到正统初年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文学样式开始渐趋式微，流弊渐生，已经不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当时文坛不少作家对台阁体文风进行了批驳和纠正，而以李东阳为宗主的茶陵派就是在此文学思潮中脱颖而出，李东阳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成就使其逐步成为文坛的领袖，引领当时的文学时尚，盛行一时，凸现出茶陵派所在时代的精神内涵与文学魅力。茶陵派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衔接台阁体与前七子的过渡流派，作为成化、弘治时期文坛的主流派别，兴起于台阁体既衰，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尚未兴起之时。茶陵派担当了历史赋予的重任，在对台阁体纠偏起衰的同时，又为“前七子”复古理论的张扬奠定了基础，扮演了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同时代的吴中文学作为明代一个特立独行的文学派别，远离朝政，表现出浓郁的市井文学色彩，然而不少吴中人士与茶陵派成员交往密切，其中不少吴中士子还是茶陵派的骨干力量，他们对茶陵派的形成和崛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正是由于茶陵派与台阁体、前七子、吴中派等文学流派的相互交融与各自求异，明代中期文坛呈现出流光溢彩的景象。

在明代前期，台阁文学成为时代主流，台阁体正是明王朝鼎盛时期的特定产物，这批作家以纯熟的技巧来抒写馆阁士大夫的生活感受，宣扬太平时期文人所体会的浩荡皇恩，在“盛世”时期此类文体大有市场，适应当权政治的需要，在统治阶层的倡导和引领下，当时被整个文坛视为主流，风靡一时。故沈德潜云：“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按：即指三杨）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矣。”^[1]然而到了李东阳所处的时代，已不复有宣德时期的“治平之象”，明王朝政治生活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趋势，内忧外患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与三杨等人的“和平易直之心”相比，李东阳等茶陵派作家对台阁政治和庙堂文化多了几分失望，多了几分离心力，在政治生涯回天乏力的心态中，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探索中，以改变和创新文坛风气为己任，力图纠正台阁文风的流弊，突破政治对文学的严重束缚，使文学沿着正常的道路向前发展。李东阳创作成就和文学批评的鲜明提出确定了他在明中期文坛的领袖地位，同时也结束了台阁体文风的统治，开辟了以茶陵派为代表的真诗复生的局面。在《麓堂诗话》著作中，他强调诗歌要有比兴，要表现真实的“情思”。他说：“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2]李东阳对台阁体末流啾缓卑弱、冗沓肤廓的文风深恶痛绝，力倡音律格调之说，希望用典雅矫健的文风来革除台阁体弊病；同时他“立朝五十年”的台阁内臣身份，“四十年不出国门”的生活阅历，使其文学作品未能完全摆脱台阁体诗风的影响。

李东阳所领导的茶陵派在理论批评上的追求与文学创作实践的背离，受到了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的强烈批判，虽不少七子派成员与李东阳有松散的师生关系，但政见、性格、文学喜好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最终分裂，李东阳以及茶陵派受到前七子复古派方

[1] [清] 沈德潜、周准《明诗别裁集》卷三“解缙”条，P59。

[2] [明] 李东阳《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P1374—1375。

方面面的攻击，既有对其人品道德的谴责，也有对其文学创作的排斥。茶陵派与前七子理论和创作的交叉刺激，为前七子复古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东阳主张广泛学习古代诗歌的各家各体。曾创作《拟古乐府》一百零二首，序称：“予尝观汉魏间乐府歌辞，爱其质而不俚，腴而不艳，有古诗言志依永之遗意。”^[1]他的得意门生何孟春专门对李东阳的拟古乐府作注，足见重视。学习汉魏乐府是元明时期复古论者的重要主张，因此尽管李东阳的诗文从内容到风格都没有完全摆脱台阁体的影响，甚至被李梦阳讥为“取媚时眼”，但论及明中期的复古思想，终不免追溯到李东阳。正如王世贞所言：“长沙之于何李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2]李维桢亦说：“本朝文章沿宋元之陋，茶陵李文正起而后返古。”（《罗先辈制义题辞》）钱基博先生在《明代文学》一书中认为李东阳在明代复古运动中有“开山之功”，称颂“东阳宏奖群英，力追正始”，赞其诗歌“纵横跌宕，能盘硬语，极意规模少陵”，近体“亦深得唐意”^[3]。

可见，李东阳是明代前、中期文学风尚转变的关键人物，他既可看做是台阁体作家的殿军，又可看做是前七子派文学复古的先驱。

吴中派作为明中期文坛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地域色彩较明代中期其他文学流派都要强，相对也比较封闭，自成一个诗歌体系，具有浓郁的山林和市井气息，他们以张扬个性，描写日常生活为主题，在艺术上追求心灵的自我感受，不以政治教化为依托，文学上摆脱了政治的依附地位，真正体现了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价值。尤其当地经济的发展，世俗生活的介入，加速了吴中文学市民

[1]〔明〕李东阳《李东阳集·诗前稿》卷一，P1。文中所引用李东阳作品均出自《李东阳集》（三卷本）及《李东阳续集》，以下不再详细标注，仅用简称，如“《沧浪吟》”一诗出自《李东阳集·诗前稿》卷三，简注为《诗前稿》卷三，下同。

[2]〔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历代诗话续编》（中册），P1044。

[3]钱基博《明代文学》，P81—82。

化的进程，使明中期雅文学的俗化向前推进。吴中文学的俗化与茶陵派诗歌的雅化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再加上吴中士子们先后在科举场上败北，两派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寻求适合各自发展的诗歌特色，为明代中期文坛增添了鲜活的动力。

对茶陵派的形成，茶陵派宗主李东阳诗论体系，茶陵派与台阁体、前七子、吴中派关系的研究能够有助于加深对茶陵派在明中期文坛成就的认识，尤其是对茶陵派力挽台阁体末流的弊病、格调说的确立、复古理论的提出都奠定了基础，为明中期文坛的发展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无论是承认还是批驳，其后的流派思想都没有绕开茶陵派所创立的理论学说，因此对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的系统研究，明确其在明中期文坛应有的文学地位，对揭示茶陵派在明代中期文坛承前启后和拓展之功有深远意义。

株洲市茶陵历史与文化研究会第三届组成人员名单

名誉会长：阳卫国 赵湘珍 谭件云

顾问：毛爱良 刘力量 蔡典维 杨宋虎 王建敏 段桂生
贺夏生 邝邹飞 周华社 彭雪开

会长：毛朝晖

常务副会长：向宋文

副会长：（按姓氏笔画排列）

龙志华 刘君瑜 刘柏生 陈玉明 陈进生 陈招生
陈茂祥 陈洪星 罗尔胜 罗绍昀 罗禧瑰 周晓理
周德才 侯李平 段晓茅 费水牛 姜衡松 郭平
彭新军 谭可敏 谭鑫华 颜峻

秘书长：谭鑫华（兼）

常务副秘书长：姜衡湘

副秘书长：（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亚平 龙东华 龙建新 刘文星 刘畅儿 李鹏程
张国梅 段谭云 彭小中 谭红日

理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祖元 尹烈承 邓跃东 龙年喜 向小陶 刘开元
刘茶生 刘送芳 刘振祥 刘湘元 刘湘林 刘新文
陈三龙 陈国林 陈陵 周长水 周邦发 周金云
周毅刚 段俭哲 段益民 段桃庚 段跃华 彭文胜
彭东明 彭冬明 彭物明 程晖波 谭传文 谭若坚
谭玖敏 谭秋茂 谭善林 颜文明 颜会明 颜进取
颜金仲 颜青春 颜颂阳 颜曼文

办公室主任：尹烈承

办公室副主任：刘振祥（兼） 周长水（兼）